

# 论李邕嗣和陶诗的艺术风格

## ——兼及易代之际浙东诗人和陶诗诗风的嬗变

李景霄

(辽宁大学 文学院, 辽宁 沈阳 110000)

**摘要:** 易代之际的和陶诗已经成为遗民士实现自我体认、表达自己心声的重要途径。无论是元明之际还是明清之际,和陶诗都大量涌现,且保存下来的和陶诗的作者以浙东诗人为多,表现出易代之际浙东诗人独特的精神建构。与元明之际童冀等和陶诗的清刚、幽贞不同,李邕嗣的和陶诗展现出了更为平和、古朴的风格和特点,体现出了李邕嗣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诗歌观念。

**关键词:** 李邕嗣;和陶诗;浙东诗派;诗风嬗变

**中图分类号:** I207.22

**文献标识码:** A

**文章编号:** 1672-9617(2024)01-0005-05

元明易代之际和明清易代之际都有大量的和陶诗、集陶诗出现,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,一方面,由于历代文人对陶诗品格的不断构建,已经使“和陶”成为构建自我体认、抒发自己志向的重要方式,具有鲜明的象征性意义。另一方面,由于陶潜本人的隐世不出及桃源幻境的描写,让易代之际的文人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,有了一个抒发自己情志隐蔽而有效的抓手。不同诗人和陶诗歌的风格不尽相同,对和陶诗的考察也成为我们考察诗人诗歌风格乃至性情的重要途径。易代之际的浙东诗人,在和陶诗上显得尤为自觉和敏感,不论是元明之际的戴良、童冀等诗人,还是明清之际的李邕嗣、张煌言等人,都有不少的和陶诗存世。这一方面与浙东处于战争

后方、遗民汇聚的地理位置有关,另一方面也与浙东诗派具有极强的地域性风格有关,后世的李邕嗣等诗人都对浙江先贤有着极强的地域认同。这就为我们对两个易代之际和陶诗风格差异的考察提供了合理性。遗民诗人赋予了和陶诗特别的意义,这一点多位学者已经注意到,但尚未有学者对两个易代之际的和陶诗进行对比研究。对于易代之际和陶诗的对比考察,或许对揭示诗人诗歌风格、探究浙东诗派和陶诗风嬗变有一定的意义。

### 一、李邕嗣与其和陶诗

#### 1. 李邕嗣的遗民情结

李邕嗣,原名文胤,字邕嗣,别号杲堂,浙江

收稿日期: 2023-09-15

基金项目: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(L21CZW002)

作者简介: 李景霄(1999-),男,山东聊城人,硕士研究生。

鄞县人,生于明天启二年(1622),卒于康熙十九年(1680)。少时随祖父、父亲学习《史记》《通鉴》诸书,多有逸才。曾与其父参与抗清运动,均被捕,被万泰及甬上诸遗民出手相救。其父眼见家兴国复兴无望,绝食而死,邨嗣也发誓永不仕清。李邨嗣是明清之际月湖诸诗社中成就最为卓越的诗人,徐凤垣称其“几欲夺江南半壁以自霸”<sup>[1]6</sup>。李邨嗣的诗歌诸体兼善、内容丰富,刊落凡庸,别开生面,卓然成家。其诗主要保存在《杲堂诗抄》《杲堂诗续抄》《杲堂外集》中,梗概多气、古朴苍劲,或感怀事时、忧国伤民,或怀古思人、惆怅徘徊,多角度地展现了遗民诗人复杂而深沉的内心世界。

鄞县李氏是宋代名将忠襄公李显忠之后,到李邨嗣这一代,已经成为诗书传家的望族。他在年轻时深受祖父礼法之教和祖母忠义故事的熏陶,所以在国仇家恨交织的明末清初,李邨嗣不仅有非常自觉的遗民体认,而且这种遗民意识在其诗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。

李邨嗣在甲申之变后,一直在默默从事抗清运动,虽未直接参与钱肃乐等人的起兵,但他一直在暗中支持抗清运动,如积极营救黄宗羲之弟黄宗炎、料理抗清名将章圭璋的后事等。并且他同甬上诸诗人结社吟咏,抒发遗民声气,在那个暗潮涌动的年代,这种结社本身就昭示着不同寻常的含义,在家国倾颓、血泪交织的时代大潮中,他们能够坚守自己的志气并心绪内潜,把遗民文人的悲伤和血泪都倾吐于诗文中,这本身便是一种反抗。这一点在李邨嗣的诗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,他的诗歌中有大量表现家国血泪、遗民志气的作品,其词气之激烈、语言之高昂,在遗民诗人中也是比较少见的。

## 2. 陶诗理念的易代建构与李邨嗣的诗歌观念

### (1) 陶诗理念的易代建构。易代之际总是山

河破碎的时代,给中国带来沉重的苦难和沉郁的阴霾,神州陆沉、尸山血海会深深地刺激到士们的心灵,更何况儒家千百年来的忠义传统更使士人们直面道德的挑战,这种冲击是极为巨大的,而越是此时便越能看出诗人的坚贞意气和品质追求。有的士人奋起抗争、肝胆俱碎也绝不投降;有的贪图富贵权柄、攀附新朝;有的归隐山林、心系众生,而不论他们的选择如何,都是与变幻的风云共同构成惨黯的时代底色。于是他们便用诗歌来关照现实,抒发自己独特的心灵感受<sup>[2]</sup>。对于遗民来讲,这些士人往往倾向于找到一个易代之际的高士作为心灵寄托,而陶渊明恰好正是这样一个高士形象。

陶渊明的形象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,其在唐代士人们心中的形象更倾向于普通的宦情归隐和逍遥田园,当然这也与萧统《文选》对陶诗选录的影响力过大有关。宋代以后,陶集的编纂者们更重视对陶渊明诗歌中易代含义的引申和解释,尤其是北国尽失、国破余悸正浓的南宋,更是竭力阐释其中的不仕新朝之节。如汤汉注四卷本《陶渊明诗注》中,重点阐释了其中《咏荆轲》《述酒》等咏史作品,在注释《九日闲居》时,就注曰“空视时运倾亦指易代之事”<sup>[3]</sup>。而在明清易代之时,这种对陶渊明价值意义的赋予又迎来了高潮,如张自烈的《批评陶渊明集》、黄文焕的《陶诗析义》等,均强调了陶渊明凛然大义、“殆首阳之展禽,箕山之接輿”的节义特点<sup>[4]</sup>。因此,易代之际陶诗总能迎来更多士人的关注,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,陶诗有了更多重更丰富的解读空间,而遗民们的和陶诗、集陶诗也就更能委婉地表达他们的志向和心态。

(2) 李邨嗣的诗歌观念。李邨嗣是明清之际浙东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,其诗歌理念受黄宗羲等人影响很大,但李邨嗣也有自己的阐释与发

挥。浙东诗派有着浓厚的史学传统,代表人物有黄宗羲、万斯同、卢文弨等,浙东诗人们首先面对的便是如何处理诗与史之关系。总体上来说,李邕嗣还是以经史为本的,他在《杲堂文钞·自序》中说道:“参军公谓诸孙曰‘学者不读史不能见古今,是有目无视也;不言诗不能申唱叹,是有口无声也。’”<sup>[1]395</sup>这是他在年少时受到祖父的庭训,读史能增长眼界,有深邃的史的眼光,而读诗能抒发自己的情怀,二者缺一不可。他还说道:“读书期于闻道,贯穿古今,以五经为根源,以迁、固、愈、修为波澜,此人文之本也。”<sup>[1]43</sup>可见李邕嗣以经史为本的诗歌观念。

另外,李邕嗣论诗重性情、强调创新。他认为诗歌的创作“要能各宣其所欲言,自成一家”。他认为诗歌必须出自人的真性情,是因为声就是人心,现在的诗人“各诵一先生之言,奉为楷模,剽声窃貌,转相似仿”,所以都“自溺其性情而不出”<sup>[1]417</sup>。诗歌若是一味辗转模拟,就会失去自己的真性情。李邕嗣还强调诗歌之变,年少之诗与年老之诗风格必然不同,如此才能秀而不枯。他在《散怀十首有序》中指出:“诗心之妙在能变,日变斯日新。”并且总结了不同年纪的诗歌创作有不同的特点:“年少为诗,自当精思极藻,各尽其才;至齿学渐进,于是造而高谈;而奇老,其于风格日上矣。然使守而不变,以至于极,譬如数啖太羹,频击土缶,音味遂为素然,复何可喜!余谓此当以秀色润之,盖澹而能秀则益远,老而能秀则不枯,所谓朝华既谢,斯夕秀当餐,此诚诗家日新之妙也。”<sup>[1]602</sup>只有主动求新求变,改变自己的风格,才能达到“诗家日新之妙”。

所以,李邕嗣的诗歌创作讲求创新,注重抒发自己的真实感受,而表现在其“和陶诗”中也是如此,考察其“和陶诗”不仅能对李邕嗣的遗民诗歌风格的展示上有所裨益,而且通过与元明之际

遗民和陶诗的对比,也能从一个侧面展现浙东诗人对陶诗接受的嬗变。

## 二、李邕嗣和陶诗的艺术特点

李邕嗣现存的集陶、和陶诗有二十首,虽然在其诗集中所占比例不高,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和陶诗所具备的特殊意义之下,李邕嗣的和陶诗仍然有重要的考察价值。

李邕嗣在诗文中曾多次表达对于陶渊明的尊敬和推崇,如“书题甲子怀彭泽”<sup>[1]300</sup>“陶公高洁邈然,为百世之师”<sup>[1]533</sup>“晋人惟陶公……能善抑扬,其声温然可诵”<sup>[1]431</sup>等,不仅李邕嗣如此,其他遗民诗人也多仿效陶渊明,表达他们的心曲和志向。钱谦益就讥讽过遗民这种行为:“今世隐约之士俯仰无聊,吟几篇诗,种几丛菊,咸以柴桑自命,殆长公所云陶渊明一夕满人间者,此不足为伊人道也。”<sup>[5]</sup>但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遗民文人普遍学陶的现象。

李邕嗣诗歌的风格多样,很多都是怒怀慷慨、直陈其词,展现了其性情激昂的一面。但在其和陶诗中,却深得陶公超逸闲淡之壶奥。李诗对陶诗的学习主要体现在其四言诗上,四言诗本来就具备古朴的意味,对陶诗恬淡风格的学习,使得李邕嗣的和陶诗更具有淳朴韵味。首先李邕嗣通过对自然风景景物的表达,抒写自己淡淡的愁绪,以及面对时代的摧残自己渴望得到知音的心态。如“林木萃烟,闲塘益两。中有斯人,望衡不阳。素琴在林,待尔同抚。阡陌匪遥,出户以伫”<sup>[1]432</sup>,就描写了他在农舍悠然的生活及心态,家中有素琴一张,等待友人同拂,隐曲地表达出自己渴望与友人知心而谈的状态。而这种友人未必是现实中的,正如其小序写道:“写我心曲,遗答陶公,匪有故人,语默谁同。”<sup>[1]431</sup>作者正是将陶公当作自己的知音,这样故国之思、感叹

之情就在与陶公的遥答中抒发了出来。这种感情在其余三首中也有表达:“甲子可纪,归守北窗。共叹古人,千载心从”“栖栖薄杜,日夕南征。何以写怀,赖兹友生”“聿有同音,汝巢予和。向为故人,裴国亦多”<sup>[1]432</sup>。作者不仅点名了甲子之纪,而且一再强调想要找到能够懂得自己心绪的友人,满怀的心事无人可以诉说。

李邕嗣的和陶诗在表达自身命运的同时,有时也会跳出自我,感叹命运的拨弄,把目光注意到前修身上,找寻自我心曲的出路和归宿。如:“悠悠时运,乃遘斯朝。出门眺古,立我西郊。喟彼先民,守兹道消。”<sup>[1]262</sup>作者感慨时代的拨弄和挫折,在时代的面前生出一种无力之感,自身也处于“六籍不守,飘摇一庐”的境地,此时南明小朝廷已经覆亡,新朝基本完成了统一,斯朝已至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,只能喟叹先民们所坚守的道义已经消逝。而这并不意味着作者的绝望,而是投身于读书弹琴,世事已然如此,不如及时行乐。“有书有琴,澹然斯足。用舍既分,行就吾乐。”<sup>[1]262</sup>有书有琴,这种淡然之乐已经足矣。不仅要及时行乐,与书琴为伴,而且也要“上念前修”,找寻先贤的理想和追求。“孔忧四方,乃慕曾沂。颜欣陋巷,礼乐所归。道溥斯潜,六爻同挥。斯风既邈,企言可追。”<sup>[1]263</sup>作者通过对曾沂、颜回对道义的追寻,来为自己找到当下的意义。

另外李邕嗣还有劝农诗,诗歌古朴自然,深得陶公亲事农桑、乐在其中之韵味。如“桑竹菁菁,荫兹皋陆。童牛上坂,讴声相穆。日暮各归,鸡犬不逐。遥忆羲皇,兹风未宿”<sup>[1]467</sup>。桑树、竹子、牧童、黄牛,群鸡、日暮,一派融融的田园景象,显得古朴、真淳,在这一片田园风光中,能让人忘记大时代的腥风血雨和家国辛酸。不仅描写田园景色,还表达了对农人辛苦种植的肯定,“古风古雅,味兹黍稷。油油在田,大圣所殖。矧

尔下民,乃不力穡。尔之不勤,岂其谷食。”<sup>[1]467</sup>种植田园是圣人教民,没有民众的辛勤劳作,哪里能有谷食可以吃呢。

当然,在当时的时代风气下,咏和陶诗是不可能避开陶渊明遗民身份的,即使李邕嗣在和陶诗中并未强调这一点,但是这种向往陶公风范、愿意追随陶公的心态还是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。如《饮陶公怀吉田舍二章》,前文还是描写“日暮相偕归,炊烟幸不远”的古朴景色,下文便笔锋一转,“谁咏古陶风,茫然独忘近。仰视参星横,斯怀良不浅。”写到自己的忧愁和心中的郁闷。并且有的表达还更加直接,如“陶然忘甲子,永为上皇民”,直接表达出了自己的心曲和志向,这正是李邕嗣决心不仕新朝、“永为上皇民”的直接写照。李邕嗣和陶诗虽然主要学到的是其闲淡古朴的风格,但他在论陶诗时,还是强调陶诗中的寄托遥深与壮怀激烈的咏史之作。他在《潘孟升诗集序》中说道:“陶公闲静,其本意却在《述史》《咏荆轲》一派。”<sup>[1]436</sup>在《万季野诗集序》中也提到,“陶公诗上自述史、咏古、传赞、托契千载,以寄其遥深”<sup>[1]588</sup>。

总之,李邕嗣的诗歌风格总体上是真切激昂的,但在和陶诗上却体现出闲淡与古朴。一方面,这与李邕嗣此时的心态有关。这些和陶诗的写作年代大都在其40岁以后的归隐期,此时南明小朝廷早已覆败,前朝的余晖已经散尽,诗人内心的慷慨激昂也平和了许多。另一方面,这也是李邕嗣和陶诗主动求新、求变的体现,少年时自有少年时的风采,年老时又有年老时的韵味。诗人的心态发生变化,诗的风格自然也发生了改变。

### 三、明清之际浙东诗人对和陶诗的继承和新变

元明之际也是和陶诗出现比较集中的时期,



保存下来的主要有戴良和童冀的和陶诗,并且二人也都是浙东诗人。正如左东岭所言:“和陶诗体现了元明之际浙东诗学思想的一个侧面。”<sup>[6]</sup>而李邕嗣也是明末清初浙东诗人的杰出代表,并且李邕嗣极为重视乡邦文化。这一方面体现在他积极参加甬上诸诗社,和同乡友人一起交游唱和。据谢国祯的考证,李邕嗣参加或者主持的诗社有十多家<sup>[7]</sup>。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《甬上著旧诗》的编纂,表现出他对乡邦文献的重视。所以他对同为遗民的戴良和童冀学习和继承,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。

戴良和童冀的和陶诗比较多,风格也比较复杂。但正如左东岭先生所说,二者的主体风格可以用“幽贞”和“清刚”来概括,下面举出两首试论之。戴良有《饮酒》组诗,是仿照陶渊明《饮酒》而作。其第十四首云:“里中有一士,爱客情亦至。生平不解饮,而独容我醉。我亦高其风,往还日几次。尔汝且两忘,何知外物贵。尚惧数见疏,淡中自多味。”<sup>[8]</sup>可以看出,相比于李邕嗣,戴良的和陶诗中有自己的意气,有一股潇洒之气流溢在诗中,但并未直接点出,这也是戴良和陶诗“幽贞”的所在。而李邕嗣的诗则更显老到,其淳朴自然、苦心幽微更有浑然之感。

童冀长期沉沦下潦,为其赢得诗坛声誉的正是其“和陶诗”,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选其诗36首,有24首是和陶诗,这正是由于其在和陶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和心曲,抒发出自己真切的寒士感受。如《饮酒诗二十首》其十二称:“辞受贵合义,出处亦以时。三聘有弗起,万锺有固辞。所以古君子,立志恒在兹。寸心辨义利,万事勿复疑。如何奔竞徒,甘为声利欺。驱车九折坂,日暮欲何之。”<sup>[9]</sup>展现了自己要仿效古君子“不受万锺之禄”的意向和志气,清刚、傲气显而易见。如果说李邕嗣的和陶诗是中年看惯风浪以后的平和,那

么童冀便是少年的意气昂扬,青年的骨气贞刚。

因此我们可以看出,李邕嗣的和陶诗与元明之际戴良、童冀和陶诗的风格差别还是比较大的,但也有一以贯之之处,那就是抒发真性情的诗歌观念。无论是戴良的潇洒之气,还是童冀的清刚之气,抑或是李邕嗣的平和古朴之气,都是诗人人生体验、生活经历的真实反映,也是诗人当时性格、气质的直观展现。另一方面,三者诗歌中都包含对故国远去的怀思和哀叹,也就是都发挥易代之际遗民们借助陶公抒怀自我体认的作用。而之所以风格变化比较大,一方面是诗人的境遇、写作时代不同,戴良距离易代较为接近,在其和陶诗中便展现出了较强的气节意识,而童冀距易代较远,其生活的时代已经进入了新朝,所以他较少展现其遗民心态,而是更多表现其沉沦下潦的不甘和洁身自好的气节。李邕嗣虽然生活在易代之际,也有着深刻的国仇家恨,但他写作和陶诗的年代已经是新朝定鼎之时,恢复旧国已经没有什么希望,他在其他早期诗歌中已经展现了其慷慨激昂的一面,所以当他隐居时,就变得更为平和、享受古朴的田园风光。另一方面,也是诗人自主求新的结果,李邕嗣极力反对因循抄袭,当面对众多遗民用陶诗来表达心曲时,他不屑也不愿和众人雷同,只是将其作为遣怀的工具,抒发自己平和的心性。

#### 四、结语

易代之际的和陶诗已经成为遗民士自我体认展现心曲的重要途径,无论是元明之际还是明清之际,和陶诗都大量涌现出来。这一方面是历代注陶集者不断发现、不断强化陶诗中节气观念的缘故,另一方面这也是诗人们表达自己心绪的便捷的途径。正如蔡丹君所言:“易代之际产生的拟陶相关的派生文献,其意义(下转第21页)

经历的结果,也是文学创作的基点。”<sup>[6]</sup>出于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,徐坤孜孜不倦地反复思考着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走出所面临的困境,应该如何去充实萎靡的灵魂的问题。这三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,就蕴含着徐坤对知识分子现状的深刻批判与无限反思。

《神圣婚姻》从社会的最小单位——婚姻出发,观察着社会众生与时代震荡,试图追寻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。这是一本小说更是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现实画卷,淋漓尽致地展示着社会的众生相,散发出现实主义的光辉。通过对这些众生相深层结构的研究探讨,直面社会的热点与痛点问题。将对两性关系的思考、亲情关系的反思、知识分子出路的找寻等一

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通过小说形式展现出来,及时地对时代做出了回应,《神圣婚姻》是一部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 郑思佳,吴玉杰.历史意识与人文关怀的复归:新世纪小说创作论[J].沈阳工程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2,18(1):77-83.
- [2] 徐坤.神圣婚姻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22.
- [3] 姜瑶.徐坤小说的性别叙事研究[D].长春:长春师范大学,2022.
- [4] 杨新刚.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都市小说论稿[M].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2013:134.
- [5] 夏慧玲.比较视域下徐坤小说中的“女性书写”——以小说集《厨房》为中心[J].今古文创,2022(27):7-9.
- [6] 夏乙天.阿城的边缘化自我身份认同[J].沈阳工程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2,18(4):13-18.

#### (上接第9页)

超越了一般的拟作和用典。人们以对陶集的模拟,来唤起和造就出一种新的集体文化意识,并借用这样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立场,用拟陶来决定自己的身份抉择,重建‘自我认同’之感。”<sup>[10]</sup>李邕嗣自然也不例外,作为明清之际浙东诗派的代表诗人,他也用陶诗来表达自己的心绪,但由于其诗歌理念及写作年代不同,他的和陶诗与元明之际浙东诗人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,主要表现为脱尽意气,更加闲淡和古朴。这不仅是时代的原因,也是作家自主表达、求新求变的结果。这说明浙东诗派虽然有较强的地域体认,但其中诗人们的风格也不是完全统一的,而是自主求变、求新求奇的。文学创作是与文学语境和历史成规相匹配的<sup>[11]</sup>。对两个易代之际浙东诗人和陶诗的考察,或许对于我们了解浙东诗人风格嬗变有一定的助益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 李邕嗣.杲堂诗文集[M].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

1988.

- [2] 吴玉杰.历史与人的交感互生:稽古尊贤诗作的博文气脉[J].沈阳工程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2,18(2):6.
- [3] 汤汉.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注[M].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17:4.
- [4] 蔡丹君.《陶渊明集》文献与易代诗学传统之关系[J].清华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22(5):98.
- [5] 钱谦益.牧斋有学集[M].上海:海古籍出版社,1995:462.
- [6] 左东岭.元末明初和陶诗的体貌特征与诗学观念[J].文学评论,2022(1):69.
- [7] 谢国祯.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[M]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6:109.
- [8] 戴良.戴良集[M].李军,点校.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6:206.
- [9] 钱谦益.列朝诗集[M].许逸民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2007:436.
- [10] 蔡丹君.《陶渊明集》文献与易代诗学传统之关系[J].清华大学学报,2022(5):104-105.
- [11] 任含笑,吴玉洁.“重返八十年代”的史家心态:程光炜文学史研究述评[J].沈阳工程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3,19(1):15.